

10. 13



蘇州文史資料

(十四)



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军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时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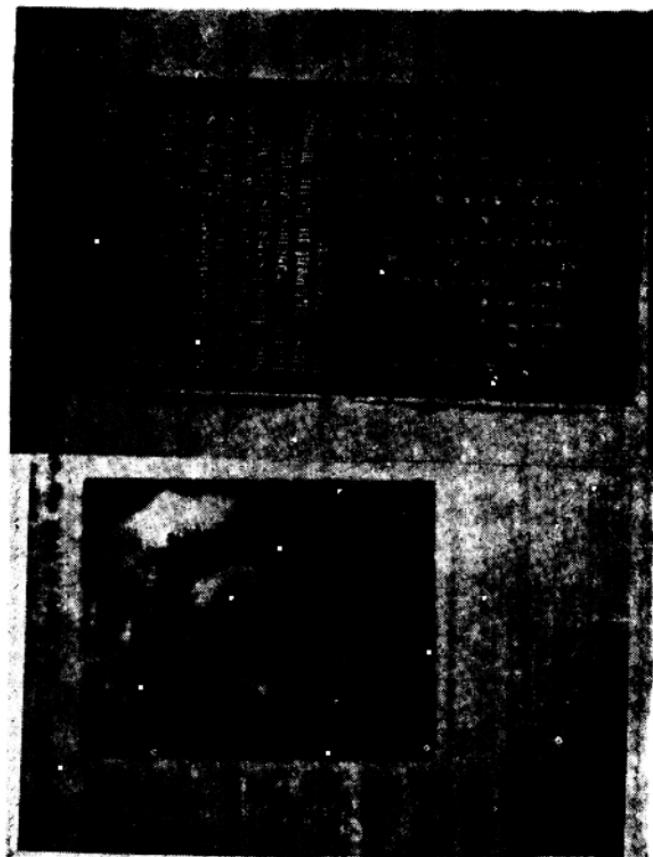
照片上“仲谦”先生，是闵仲谦（1885—1956）先生。闵氏早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江苏都督府高参兼江浙联军司令部特别顾问，及苏军攻宁炮队指挥等职。此帧原件，现保存在闵氏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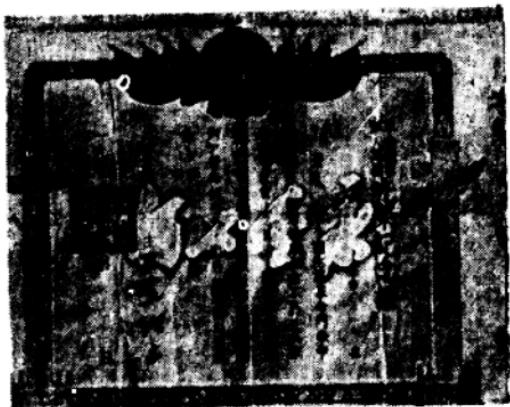
（闵介禄供稿）

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妇孺抗日慰劳团沈淑（左一）和陈波儿（右一）等抵卓资山车站时留影



劳勃脱·肖特 (ROBERT SHORT) (1932) 和肖特义士殉难纪念碑 (1947)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戴广进同志家属的光荣纪念证



戴广进在汽车驾驶座上



大盂鼎（西周）

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

重153.5公斤

现藏上海博物馆

大盂鼎
铭文（拓片）





大克鼎（西周）
高93.1厘米
口径75.6厘米
重201.5公斤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克鼎 铭文（拓片）



目 录

辛亥前后	华士龙 (1)
记先父母章太炎及汤国梨在抗日战争中二三事	章 导 (34)
难忘的绥远之行	
——慰问百灵庙抗日将士.....	沈 叔 (44)
美国飞行员肖特在吴县殉难前后	
.....吴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50)	
追忆台儿庄大捷.....	居亦侨 (57)
田家镇要塞传令前后.....	居亦侨 (59)
忆“八百壮士”.....	陆承曜 (62)
三月从军记	
——八·一三沪郊抗日血战的回忆	吴琴一 (69)
缅怀二哥戴广进.....	戴广英等 (86)
我所知道的陈鹤烈士事略.....	袁 震 (89)
九死一生记.....	翁巧生 (95)
抗战时期苏州见闻	胡觉民 (108)
灵岩山下百日烽火	
——忆抗战期间家乡片断.....	凤永益 (119)

- 护鼎记 潘景粼 (124)
护书记 薄吟秋 (127)
护钟记 吴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136)
壬申国难记 许燮蝶 (138)
庚辛八年血泪录 朱润苍 (144)
忆侵华日寇在平望的暴行 吴国钧 (156)
艰苦奋斗的东路后方医院 费介成 (159)
抗战初期苏州难民救济会纪事 黄尚志 (165)
冯玉祥将军莅苏侧记 黄秉贤 (167)
蔡廷锴将军赋诗明志 夏元铮 (169)
忆潘昌煦先生 陆承曜 (171)
记爱国青年茅修竹 叶鸿泉 (180)

辛亥前后①

华士龙

编者按：华士龙，又名彦云，江苏无锡严埭人，1881年生，1979年7月逝世。他毕业于清安徽武备练习军学堂。先后任清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事务长、排长、队官。辛亥革命时，任江浙联军江北支队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兼十一师师长。辛亥革命后，任湘粤桂联军参谋，全国特种营业稽征特派员等职。此稿系作者生前最后完成的两篇长稿之一。另一稿《二次革命》纪事，已刊于本刊第六辑。

我在1902年考入满清政府设在安庆的安徽武备练习军学堂。该学堂总办是藩台冯煦②，实际主管校务的是提调谭亦张③。学堂规定，学业速成（定期一年毕业），训练严格而紧凑。

来此学堂就学的青年同学，都是汉人。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意识非常严重，社会风气又是鄙视这样的所谓“洋学堂”，因此，同学大都家境贫寒。然则，所有同学都有一些文化知识，又且抱着习武图强的志向。因此，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容易在同学中间传播。几个年长的同学，如陈王谟④，柏文蔚⑤，冷遹⑥和我等，经常议论时政，嬉笑怒骂。学堂里的教官，也都是汉人，他们眼看满清政府腐败，大多同情学生的举动。一次，同学陈王谟拿来几本邹

容撰的《革命军》，在同学中间传观。看过这本书的同学莫不痛恨满清政府。在一个出操后的下午，正好许多学生聚在一起，又议论起这本书来，谈到痛恨处，不禁大骂“满奴”。此事被提调知道后，他下令将邹容写的书全数搜去，又逼令陈王谟立即离去并以后不准再来安庆。一面谭亦张又召集全体同学严厉训戒，说这类是禁书，以后不准再看。次日，便挂出了“陈王谟犯规开斥⑦”的牌子。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那时在学堂里起哄，都是自发的，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

一年光阴易过，全体学生毕业。柏文蔚、冷遹先后到南京第九镇⑧三十三标⑨当过管带⑩、标统⑪。我仍留在安徽，派在驻菱湖嘴新军第三营做实习官。新三营的管带便是老师（武备练军学堂的教官）顾忠深⑫。不久，顾忠深又去南京做第九镇三十三标教练官。

1904年，恩铭任安徽巡抚，委徐锡麟做巡警道⑬。徐锡麟一到任就办了督练公所。我当时还是实习官，规定要到督练公所受训（受训的人都发俸银十二两，膳宿自理）。督练公所的督练官薛哲，见我考试内外场成绩都是“优等”，又见我有些民主革命思想，平时生活俭朴，说我“品性最好”。薛哲还带我和几个一同受训的实习官去见徐锡麟。徐锡麟嘉奖说：“你们品学兼优，本道对你们寄有厚望啊！”

1905年，得到顾忠深来信，要我伴送他的家属去南京，我便向薛哲请假，薛哲和教官们都不忍放我离去，我说：“各位老师栽培我的恩德永远忘不了，我也不忍就此离开各位老师，只是我受顾老师的嘱托，不得不护送师母去一次⑭，我到了南京立即回来便了。这样，我就伴送顾妻到了南京。本想过二、三天仍回安庆去，谁知一到南京，见到顾忠深，他便说：“你的差事已经派定了，你就在这里做事吧”。我说：

“我可要失信于薛老师了。”顾忠深笑道：“你还在受训，几时委差亦不知道，那边又不是少不了你一个人，南京和安庆做事不也是一样？这里已经委差了，你就委曲一点吧”。我只得同意。想写一信辞谢薛哲，又觉得很难措词，一直犹豫着没有写。当下我便做了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事务长。1906年，又接何遂^⑯的缺，升做左队队官^⑰杨韵珂^⑱属下的一排长。不多日，见报上登载徐锡麟刺死恩铭后，自己牺牲，薛哲被捕斩首^⑲。此事牵连甚广，恩铭手下人（属端方一派的）搜捕督练公所，杀害了我在督练公所的许多同学（凡我认识的同学竟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到三十三标，我的许多同学和同事都感到悲忿。当我知悉薛哲惨死的消息，更是悲伤知己，想不到督练公所一别，竟成永诀。恩铭死后，冯煦接任安徽巡抚。冯煦信任顾忠深，招顾忠深去安徽当了新军混成旅旅长^⑳。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这时我已升做队官），清廷举行太湖秋操，安排南京第九镇与湖北第八镇进行对抗演习。为此，清廷特从安庆经潜山县、太湖县至湖北省建造一条军用公路，逢山开路，遇水造桥，以便行军和驶运辎重、炮车，规模颇大。第九镇规定先用轮船运往安庆登陆，然后步行至太湖县与第八镇对阵。当运送我们的船队抵近安庆时，早见岸上人山人海，码头上的人都来欢迎和看热闹的。那时，我国还没有飞机、坦克等武器，第九镇已有步、骑、炮、工、辎及卫生、汽球、电讯队等，在我国陆军中堪称完备了。当我们上岸整队，军乐开道，全军行进时，看热闹的人都欢呼起来。前来欢迎我们的，大都是安徽混成旅的军官，有顾忠深和我的许多同学在内。顾忠深和同学们特地为我们参加这次秋操的同学设席欢宴。我们这些从未打过仗的军官，都为能参加这次实战演习感到异常高兴。在安庆稍停了几天，便起队到太湖县^㉑。第

八镇则自武汉经黄州而来，其兵员配备大致与第九镇相仿。

演习开始有规定：（1）演习所用枪弹、炮弹都应只是空响弹，不准有弹头；（2）炮兵距“敌”三十步内不准开炮、步兵距“敌”十步内不准放枪；（3）故违伤人者，有司论罪。布置就绪后，演习正式开始。

最初，两军是以遭遇战的形式出现的。第九镇向前推进，大队之前有营级前卫探导，营前卫又分尖兵、排前卫、队前卫。营前卫与尖兵、排、队之间各相距200—500米，总距2000米左右（正是当时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左有左卫左斥候，右有右卫右斥候，各距大队1500米左右，断后也有后卫卫护。

秋操在太湖县附近方圆几十里的丘陵地带进退拉锯，已“战”了三天，每天“战”况都十分激烈，且愈“战”愈猛，整个战场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两军对垒，各显神通，变幻无穷。至夜晚则自守休整筹划。

具体的战术审核，如攻占“敌方”山头。迂回穿插、侦察“敌情”、后队支援、后勤辎重供应、步骑或步骑炮合作推进、战地救护、汽球监视等等，都由陆军部来人过目亲训。我所部为机枪队，就有陆军部来人多方出题，进行考试。此次秋操为多时筹备，清廷特邀各国军界要员和驻华使馆武官来实地参观。但由于经验缺乏，曾闹出笑话。我亲眼目睹的汽球队协助炮兵侦察目标一事就是一例。汽球队系由日本人装备。在中国军史上，太湖县秋操还是首次使用。日本技术教官多次试验都不得升腾，时“战”况正烈，炮兵标统王遇甲②急不可耐，随手将马棒乱打日人，日人滚地嗷叫，无奈，日人忍气吞声，勉力将汽球升空了事。此次秋操虽有不少错误、失策，暴露了计划不周，经验缺乏，但这样的盛况，在我国军事史上还是少

见的。

我记得，那天管带传下命令说：“统制徐令：各国来宾称赞，诸位大人嘉许，将士宜各用命，毋忽。”官兵更是振奋勇跃，斗志旺盛，但演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然接到北京急电：“皇上、皇太后晏驾”^①。两镇军队只得停止操演，举行哀礼。举哀仪式是步兵列队，倒握枪枝（将枪口向地，枪柄朝天），乐队吹奏哀号，统制徐绍桢^②嚎啕大哭，官兵议论纷纷^③。

数日之内，军中又接急电，说：“安徽混成旅炮兵营队官熊成基兵变，营长陈昌墉^④殉职；熊成基败逃。”后来得知，该次兵变实由顾忠深（该旅旅长）暗助，但由于起义军人寡势弱，目的不明，又有叛徒告发，遭到清王朝镇压，终告失败，响应者大部被捕，有四人被斩首示众，顾忠深亦受株连，与被斩四人一同绑赴刑场，已准备开斩，恰安徽抚台冯煦^⑤闻讯赶到，大呼“刀下留人”，才停止行刑。冯直奔端方住处，辩论是非曲直，为顾忠深百般洗刷，端方词穷无奈，交由臬台按察使朴梓桐亲审。顾忠深矢口否认与起义有关，朴梓桐又无充分佐证，只得以“用人不当”之罪，判处顾忠深“发配张家口军台效力”^⑥。我又有许多同学，在熊成基起义中牺牲了。

熊成基起义失败后，清廷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为第九镇也会揭竿而起。清廷对第九镇疑虑的根据在于：第九镇，特别是我们三十三标的军官，大都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士兵又都是征来的新兵（不是招募的），他们思念故土，痛恨满人，所以三十三标是出了名的“革命军”。两江总督端方^⑦此次正亲自观操，当他得到熊成基兵变消息后，风闻下属亦将起事响应，即惊慌逃走。其实，第九镇官兵对于熊成基起义，事先毫无所知。端方走后，立即调动湖北第八镇围住第九镇大营，以作监视，更逼令我们三十三标到长江边扎营，又派来四

艘军舰巡查附近江面，将舰上炮口对准我们。第九镇官兵遭到这样的境遇，无不义愤填膺，三十三标的官兵，更是睚眦欲裂，都将子弹顶上了膛。此时形势，兵变一触即发。头脑冷静的同学鉴于双方力量悬殊，知道冒险行动必然招致无谓的牺牲。最后，议定警戒应变。有一位同学写了一首诗：“鱼肉受刀俎，人在荆棘中，前后方十日，悲欢大不同。”这首诗也表达了当时的一些心情。

后来，端方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紧逼行动，事态便也没有发展下去。

第九镇行动获得自由后，端方又玩弄起权术来了，他既想笼络人心，又想为秋操摆弄一番，于是宴招了第九镇全体军官。宴席上，每人拿到了一只江西官窑定制的酒杯^②，名为秋操纪念杯。端方还以私人名义赠物。他赠我两把摺扇，一把扇上有他自己作的诗，诗云：“漏声透入碧窗纱，人静秋千映半斜，沉麝不烧金鸭炉，淡烟笼月照梨花”。还有一扇，上画有达摩祖师坐在蒲团上，大概出自当时某名家之手，也有一诗，诗是苏州知府张船山所作，诗云：“西来谁信渡江难，波浪萧萧一苇寒，面壁十年缘底事，者会丢去破蒲团。”两扇都由端方亲笔题写，给他人的物件大同小异。

不数日，第九镇仍乘轮船返回南京，太湖县秋操就此结束了。

溥仪登基。次年春节，标房^③颁布红诏，为宣统元年。

当时，我和同学们虽说有点“革命思想”，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只希望国家能够强盛起来，满人不欺负汉人，列强不侵略我国，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亦可。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日益腐朽的清廷对外卑躬屈膝，甚至如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后，还向法国侵略者求和，

签订丧权辱国的安南条约。对内则滥施淫威，把汉人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我们这些人，遵旨到太湖县秋操，还向死掉的皇帝、皇太后举哀，真是最恭顺也没有了，然而清廷却将炮口对着我们。稍有一些民族自尊性的人谁愿甘当洋人和清廷的奴才。至此，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山先生的“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我和同学们都有志把满清皇帝赶出金銮殿。

陈王谋事件、徐锡麟、熊成基事件、秋操事件，对我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宣统登基以后（就在1909年这一年，我被派到将校研究所学业，回镇仍任队官），第九镇驻在南京的二年多时间里，民主革命的风潮到处此起彼伏，官兵深受其影响，思想认识普遍提高，特别是下级军官，革命情绪更为高涨，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在那些日子里，军事训练认真严格，人们确实意识到必有实战的一天。

1910年（宣统二年），两江总督端方镇压革命运动更加雷厉风行，仅举查办赵声^⑩一案，便可见其一斑；赵声原是三十三标的标统。一次，他带了全标官兵去明孝陵凭吊，列队演说，宣传满人种种罪恶，并说明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宗旨，号召官兵团结一心，推翻满清王朝。（那时我还没有到三十三标。我到三十三标后，赵声还是标统。平时接触，觉得他和善可亲，并能与部下同甘共苦，深受部下的爱戴，我与赵声相处不久，他便到广东去了，赵声去广东还是1905年的事，那时，端方还没有做两江总督）。此时端方竟然追查起五年前赵声在明孝陵演说的事，还说要追查同党。一时第九镇人人紧张，个个自危。统制徐绍桢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因徐绍桢素知端方为人，若因此受到牵累，丢官事小，甚至身家性命亦无保障。端方为追查赵声案，特派亲信俞大鸿^⑪做三十三标标统，严

加查问。其实，端方的用意是想借此来压制第九镇，特别是压制三十三标的革命情绪，其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不过，也制造了一番紧张气氛，换了三十三标标统，安排了几个亲信。

柏文蔚此时是三十三标第三营管带，因在俞大鸿属下受到很大压力，当下便离职而去。徐绍桢自经过太湖县秋操的教训，又遇到这一次端方追查赵声案，觉得清廷对他不信任，从此岌岌自危，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

辛亥年（宣统三年）三月（即1911年4月），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武装起义失败，收到遗骸的殉难者便有七十二位（葬于黄花岗）。消息传到南京，我和同学们无不为死难英烈的精神所感动，对清王朝愤恨的心情难以笔墨抒写。经过几年酝酿的士兵也都跃跃欲试。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跃马扬戈于沙场，把祸国殃民的清王朝马上推翻。

当年九月（1911年10月10日），我们热切期待的一天终于来到，震撼世界的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南京：“武汉革命军起义，两湖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勋逃到军舰上去了，黎元洪^④为都督。”第九镇官兵都禁不住雀跃高呼：“响应武汉”！统制徐绍桢既无法制止部下的革命行动，又不能解除张勋对自己的怀疑和威胁。他知道只有响应起义才是出路。但他恐在南京城内与张勋的军队冲突，伤害百姓，失了民心；况且，第九镇的军力也不占优势，三十五标常驻在镇江，三十六标远在江阴，全镇首尾不能相顾，挤在城内又不易进取退守。徐绍桢便下令将全镇调到距南京城约一百里的秣陵关去。当时，从南京城内调去秣陵关的有三十三标，三十四标两个标的步兵，另有骑兵标、炮兵标，工兵一个营，辎重一个营，卫生一个队，电讯一个队，军乐一个队，担架一个队和大小行李车等。第九镇还有许多旗人军官，此时叫他们暂时回家，照领薪